

探析贾湖骨笛承载的社会信息

宋 爽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科技史与科技考古系 安徽合肥 230026)

The pre-research on bone flutes and bone whistles are always from key that, as one kind of the musical instruments, the bone flute and bone whistle are the symbols of the level of music at that time. From the discoveries of the prehistoric bone flutes and bone whistles at China and other foreign countries, by the comparing on the ages, the types and the materials, the analysis on the development and the remarkable preference of some representative bone flutes of China, we try to explain the information of society from the bone flutes and bone whistle.

Key words: prehistoric civilization history of music bone flute bone whistle

内容提要 前人对骨笛、骨哨的研究大多将其作为一种乐器,单纯从音乐的角度探讨当时的音乐水平。尝试从另一个角度即年代、种类和材料等方面,对中外出土的史前骨笛、骨哨进行比较,分析出国内具有代表性的贾湖骨笛的发展历史和选料上鲜明的偏好性。

关键词 史前文明 音乐史 骨笛 骨哨

中图分类号 K876.1

文献标识码 A

音乐作为人类文明的基本形态和载体,如同语言、符号、文字、绘画、雕塑、舞蹈等,在人类文明发展的历程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它是最古老、最具普遍性和感染力的艺术形式之一,是通过特定的音响结构表达思想和情感必不可少的形式,是精神生活的有机组成部分。音乐是人类共有的文化现象,已经出现于世界各地的史前文明中,但是由于受到语言、文字等记录手段的限制,当代人只能通过考古发现的原始乐器实物对史前音乐文化的发展轨迹进行研究。研究史前乐器不仅完善了音乐发展的历史,而且从乐器的数量、制造的工艺、演奏的水平等方面还可以更全面地复原史前社会发展的面貌,为人类史前文明的探索提供合

理有益的推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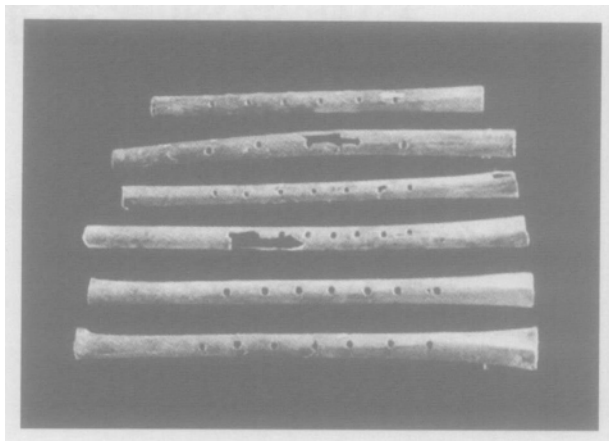
黄帝命伶伦创制乐律,是一个相当动人的传说故事。战国的《吕氏春秋·古乐篇》中记载:“黄帝令伶伦作为律,伶伦‘听凤凰之鸣,以别十二律’;当时伶伦跑到一个叫‘大夏’的地方,又到昆仑山之阴,听到了凤凰宛转的鸣叫声,他用腔体厚薄均匀的竹子断取两节之间,根据凤凰叫声的高低定出了12个律管和‘六律’、‘六吕’。这就是后来音乐中‘十二律’律名的来历。近年来在浙江、河南等地考古出土的原始的骨笛,使伶伦造乐的神话,得到了实物的证明^[1]。另记有尧使乐人质作乐;‘帝尧立,乃命质为乐。质乃效山林溪谷之音以歌,乃以麋置缶而鼓之,乃拊石击石以象上帝玉磬之音,’

以致舞百兽。”这些关于音乐和乐器起源的传说,说明了在史前,我们的先人已经有了相当丰富的音乐活动。

一 骨哨与骨笛的发现

骨哨是一种外形呈圆柱形、中空、一侧有少孔的古老管乐器,在中国史前多利用鸟禽类的中段肢骨制成。1973年在浙江省余姚市的河姆渡遗址(距今约7000年)曾出土了160余件骨哨,仅是第四文化层就出土了45件,长6~10厘米不等。哨身呈弧形,在凸弧一侧刻有圆孔或椭圆孔,以双孔居多,少数有三孔,其中有件骨哨腔内还插着一根肢骨,推拉时会产生不同声音,可以模仿鸟禽的啼叫声。最初,可能是用在狩猎时充当拟声工具以诱捕飞禽,后逐渐在乐舞活动中作为乐器使用。这种作法,当前仍然存在于一部分少数民族原始部落的狩猎活动当中。江苏吴江梅堰新石器时代遗址(距今约4000年)和黄河流域甘肃永靖的莲花台辛店文化遗址(距今约3000年)中也有类似的骨哨出土。河姆渡遗址之所以会出土那么多的骨哨,可能与其处在水乡地区,水禽众多,捕猎活动发达,取材相对容易有关。

骨笛与骨哨的主要不同在于:骨笛的开孔较多,多为两孔以上,而骨哨的开孔较少,多为一孔或两孔;骨笛有着较为丰富的音高、音色的变化及音量的变化,而骨哨在这方面则明显欠缺。从骨哨到骨笛,存在着明显的由低级到高级、由简到繁的发展轨迹。关于骨笛,最重要的发现是20世纪80年代在河南省舞阳县贾湖城北22公里处的裴李岗文化遗址墓葬中出土的一批骨笛,当时共出土25件,其中完整器17件,残器6件,半成品2件,5孔、6孔、8孔各1支,7孔笛多达15支(图一)。与河姆渡文化遗址出土的骨哨相比,贾湖骨笛在时间上早了1000年左右。贾湖骨笛中的优秀代表M282:20是一支全长22.7厘米,全器通体呈浅棕色,优良光滑,制作精致,为保存最完整的一支骨笛,除七孔外,在第六和第七孔间靠近第七孔处还钻有一小圆孔,经测音得知,此小孔应为调整第七孔发音而钻的调音孔^[21](图二)。经音乐专家童思良、黄翔鹏等先生检选M282:20骨笛进行鉴定测试,发现该骨笛已具备音阶结构,发音较准,音质较好,可以吹奏出旋律。并且在《Nature》网站(www.nature.com)上发表了由该骨笛演奏的民歌《小白菜》,证明具有相当完美的现场演奏效果。测音试验表明我们的祖先在8000年前就已经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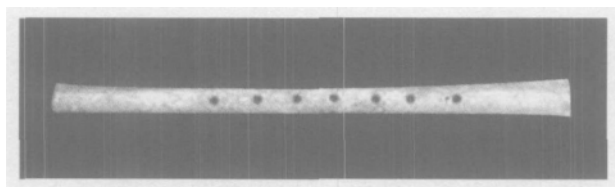


图一// 裴李岗文化遗址出土的骨笛

明了“有可能是七音齐备的古代下徵调音阶”,这将我国乃至世界音阶形成的历史向前推进了数千年。

2001年在对贾湖裴李岗文化遗址墓葬进行的第7次发掘中发现了一支二孔骨笛。该骨笛出土时已经断为两段,长约20余厘米,呈棕黄色,骨笛两端刻有规则的菱形花纹,且细如发丝,两孔靠近笛的两端,孔径约3毫米,经¹⁴C测定为8000年前的实物,其质地与历次出土的骨笛类似,应为猛禽类动物肢骨。二孔骨笛是该遗址首次发现,也是历次发掘中最为精美的一件。同时这次考古还出土了3支七孔骨笛,其年代、质地与二孔骨笛相似,加上前6次的发掘出土,目前舞阳贾湖遗址共出土骨笛近30支。数量如此之多,品种如此之丰富,在音乐考古史上是罕见的。

世界上目前考古发现最早的一支骨笛是1995年在斯洛文尼亚(Divuje cave near Lubiana)发现的,距今有5万年。这支现存两孔的骨笛是古老尼安德特人利用洞熊(cave bear)的腿骨制成的。1994年德国南部的布劳堡峪勒东南环城山岳中一个名为盖森科略斯特勒(GeiBenklöstle)的洞穴发现了35000年前的一支骨笛。这只骨笛是用当时一种天鹅的腿骨制成,有12厘米长,直径在8~9毫米,笛身有3个音孔,用骨笛现存的3个音孔,可以吹出mi、so、la、do⁴个音。1997年在德国北部杜塞尔多夫(Dusseldorf)附近著名的古人类遗址尼安德塔(Neanderthal)发现的一支骨笛,距今约43000~82000年,骨笛是用洞熊的腿骨加工而成。不过这支6音孔骨笛出土的时候只剩中间2个完整的音孔,其上下两端均断裂遗失。考古



图二// 贾湖 7 孔骨笛

学家还在德国南部乌尔姆附近山区的一个洞穴发现了一支旧石器时代晚期的笛子。它长 18.7 厘米,用猛犸象的象牙雕成,有 3 个指孔,距今约 3 万年。制造和使用这支笛子的人是生活在上个冰期的旧石器时代晚期的尼安德特人。初步尝试显示,这支笛子能吹出相当复杂的曲子,音调相当和谐,属于后世在亚洲地区很流行的五音阶,而非全音阶。近年在俄罗斯发现的骨笛距今已有 13000 年左右的历史,出土于俄罗斯石器时代晚期的猛犸牙,上面有敲打摩擦的痕迹。经专家鉴定,2 万年前克罗马努人也曾将它用作乐器。

此外,在国外也不断涌现出有关骨哨、骨笛出土的报道,如英国的威尔士出土了距今 6000 年的由羊的跖骨(sheep metapodial bone)制成的骨制乐器,有 3 个开孔,据推测是骨哨或骨笛。法国也出土了距今 4 万年的由鹿骨制成的骨笛,以及距今 4000 年的由秃鹰骨制成的骨笛。荷兰的弗里斯兰省发现了中古时期的由鹿骨制成的骨笛。还有用火鸡骨和山羊骨制成的骨笛等。

二 选材的偏好性

看了上文的对比材料,我们不免会产生一些疑问:国外最早的骨笛可以追溯到 5 万年前,也有 3 万多年前的骨笛,中国最早的贾湖骨笛却只有 9000 年,在骨笛的年代上,为何国外出土的史前骨笛明显比国内的久远,这是因为国内史前文明不够发达,还是因为有许多未知的考古空间等待着考古学家去填补?于是使得一些人产生了一种观念:中国的最早的贾湖骨笛在时间上是如此单薄,因此得出结论——贾湖骨笛没有深厚的积淀,达到的水平也是有限的。前人对骨笛、骨哨的研究大多单纯从音乐的角度,将其作为一种乐器来探讨它所反映的当时音乐水平,以此证明贾湖骨笛是最原始的,代表那个时代最高水平的骨笛。本文尝试从另外一个角度,通过对国内目前发掘出来的,代表着国内史前骨笛最高水平的贾湖骨笛的分析,即从骨笛的选材偏好性以及骨笛所承载的社会信息去探讨,来回答上面提出的疑问。

在骨笛的制作用料方面,为何国内的骨笛制作大多使用丹顶鹤、鹰等大型飞禽的肢骨,而国外的骨笛在材料的选择上则显得更富有多多样性,使用了包括天鹅骨、鹰骨、熊骨、鹿骨、山羊骨、火鸡骨等多种材料,似乎在用料方面涉及了当时出现的许多动物,这种差别是因为国内缺乏这些动物,还是先人们在选料上更具偏好性?国内的史前骨笛除了作为一种吹奏乐器代表当时人类文明的发展水平之外,是否还承载着更多的社会历史信息?

音乐的发展是与社会发展同步的,要进一步探寻贾湖先民们在骨笛选料上的偏好性,我们应当追寻当时的社会生态环境。贾湖遗址位于河南省舞阳县北舞渡镇,据文献^[3]中提供的资料表明,贾湖所在地区位于北亚热带向北暖温带的过渡地带,气候温润多雨,地貌类型为淮河上游支流冲积—湖积平原,地势相对低洼,排水不畅,本地区河流众多,流经舞阳的大小河流有 10 多条,其中主要有沙河、灰河、泥河、三丰河、三里河,加上温润多雨的气候,可以据此推测当时的贾湖地区存在着大面积低湿洼地和丰富的野生动植物资源。文献^[4]中列举贾湖遗址动物群组合有:貉、紫貂、狗獾、豹猫、狗、野猪、家猪、梅花鹿、四不象鹿、小麝、獐、羊、牛类、野兔、天鹅、环颈雉、丹顶鹤、扬子鳄、青鱼、鲤鱼、黄缘闭壳龟、中国花龟、龟科属种未定、中华鳖、杜氏珠蚌等多种软体类动物。据河姆渡遗址的发掘情况,其动物骨骼多出土地于第三四层,尤其以第四层最多,达上万余件,大都比较破碎。根据鉴定^[5]共有 61 种,其中脊椎动物 58 种,无脊椎动物仅 3 种。脊椎动物中包括鸟类、鱼类、爬行类及哺乳类,哺乳类的种类最多,既有灵长目、鳞甲目、啮齿目、鲸目、食肉目,又有长鼻目、奇蹄目和偶蹄目等。这些丰富的动物资源表明当时贾湖和河姆渡聚落所在的地方已经拥有了相当丰富的食物来源,为长期稳定的定居提供了可靠的食物保障。从骨笛制造的材料来看,当时丰富的动物资源为骨笛用料提供了多种选择,可见国外史前骨笛所用材料在国内均不罕见,有些动物资源还相对丰富,这就使得贾湖骨笛在用料方面的偏好显得尤为突出。

首先,从贾湖遗址的动物群落中,总共发现了三种飞禽:天鹅、环颈雉、丹顶鹤,这三种鸟都极具观赏性,其中天鹅和丹顶鹤均属于大型涉禽,从国外资料来看,有利用天鹅肢骨制作骨笛的先例,但贾湖出土的近 20 支骨笛全都是用丹顶鹤的尺

骨制作而成的,为何贾湖先民们如此偏爱丹顶鹤?

贾湖骨笛所使用的材料来源——鹤,属于大型涉禽,喜欢栖息于湿地之中,有着“湿地之神”的美誉,因为它们对湿地的生存环境变化十分敏感,所以鹤类的大量出现从一个侧面验证了当时贾湖区域有着十分舒适的地理环境,这给人类和动物的长期居住提供了必要的条件。世界上目前现存13种鹤类,我国有9种,是世界上拥有鹤类最多的国家,其中丹顶鹤是我国最著名的鹤类,历史上曾广泛分布于我国的东部。鹤以其优雅的体态、飘逸的步履和淡雅的气质自古就深受人们的喜爱。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中对鹤的鸣叫就有着高度的赞誉:“鹤鸣于九皋,声闻于野;鹤鸣于九皋,声闻于天”,鹤还是瑞寿之鸟,自古就有“松鹤延年”、“鹤发童颜”等说法,可以说鹤是我国文化中一种神鸟,自古就倍受人们推崇。贾湖骨笛的用料选自丹顶鹤,一方面由于有着舒适的生存环境,当时在贾湖区域有着大量的禽类动物,特别是丹顶鹤。另一方面,只选用丹顶鹤的尺骨,而不象国外的骨笛用料取材那么广泛,可能也是缘自贾湖先民们对鹤类的原始崇拜。浙江余姚河姆渡遗址出土的“双鸟太阳纹蝶形器”和“鸟形象牙圆雕”以及用鸟骨制成的骨哨也说明了中国的原始人对鸟的崇拜。

其次,贾湖骨笛在材料的使用上,只使用丹顶鹤的尺骨(位于鹤的翅膀部位),为何不是丹顶鹤其它的部位的骨头?如果说是因为鹤的尺骨中空壁薄,比较符合骨笛制作的要求,我们更愿意相信这种选择不是偶然,而是有着它非表面意义的内涵。因为鹤的其它部位不是绝对不可以作为骨笛的材料,就曾报道过当代人利用鹤的腿骨成功制成骨笛的新闻。不要说生活在生产力低下的原始社会的人们,即使是身处发达社会的当代人在看到姿态优美的丹顶鹤振动翅膀翱翔于蓝天白云中,也会羡慕不已,心存遐想。这就说明了古今中外的人不约而同地对飞翔的向往。贾湖的先民们便把这种崇拜和向往寄托于骨笛,所以他们选择丹顶鹤翅膀的尺骨来作为骨笛的材料也就没有什么好奇怪的了。

三 身份的象征

史前考古没有任何文献记载可供参考,所以史前考古的研究对象只能是遗迹和遗物。史前墓葬遗址及其随葬品考古的史学研究,在史前史研究中其地位是不言而喻的。“目前主要依靠墓葬材

料,墓葬的大小,随葬品的多寡反映出墓主人的身份地位”,而墓葬“是当时人们生前社会的一个缩影,最能反映其社会形态”^[6]。随葬品在对史前考古中的地位是如此之重要,那么贾湖骨笛作为贾湖文化的重要随葬品,它所承载的史前社会文明又是如何呢?从文献^[7]中的“贾湖遗址骨笛及共出龟甲、叉形骨器一览表”中可以看出,在贾湖遗址发现的349座墓葬中,随葬骨笛的墓葬有16座共计19件,而且随葬骨笛的同时大多随葬了龟甲和叉形骨器,特别是出土了两只制作精美的骨笛的编号为M282墓葬的随葬品甚至达到了61件。虽然不能确切的知道这些随葬品是否有着“法器”或某种“道具”等象征意义,但是骨笛作为随葬品之一,带有较明显的专属性,可能是一种身份的象征。

一方面,贾湖骨笛在当时的社会中是珍贵的,对于墓葬的主人来说是非比寻常的。从这些随葬的骨笛排放的位置可以看出,随葬的骨笛位于手边、股骨下面,紧紧挨着墓葬主人,有着一种不离不弃的意义。首先,从骨笛和其它随葬品的数量上的对比可以发现,骨笛的数量远远少于其它随葬品,正如贾湖遗址骨笛及共出龟甲、叉型器一览表所示,无论是墓葬个体的数量对比,还是整体墓葬的数量对比来说,骨笛均少于龟甲和叉型器的数量。其次,在贾湖所有墓葬中骨笛并非是普遍存在的,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的墓葬的主人可以拥有骨笛作为他们的随葬品,从“贾湖遗址骨笛及共出龟甲、叉形骨器一览表”中可以看出,在贾湖遗址发现的349座墓葬中,随葬骨笛的墓葬有16座共计19件,这也说明了骨笛的珍贵性。再次,考古发现在有的骨笛中部有音孔的一段有用布类纺织物缠裹的痕迹,这可能是骨笛的主人相当爱惜自己的骨笛,以用布缠裹骨笛来保护骨笛不受伤害。作为贾湖骨笛精品之一的M282:21号骨笛,据考古发现它在墓葬主人生前已经折断,且进行过精心修理,在折断处的骨壁上钻了14个小孔,用细线进行缀合以继续使用。对已经折断的骨笛尚且如此珍视,由此可见骨笛在当时是相当珍贵的。

另一方面,特别值得注意的是2支半成品骨笛,其中一支(M55:7)出自墓葬,另一支(H87:2)出自灰坑。这两支骨笛器身上未见音孔和设计痕迹,但都截去了两端或一端的骨关节,不能够吹奏,只是半成品。这很值得我们去思考,这种半成品不是为了吹奏而制作,在现实生活中的实用性不高,那它们的作用是什么呢?又为何会随其它的

物品当作陪葬物品呢 就如^[8]所言“可能有意为陪葬所制作”。半成品的价值,可能就是为了显示墓葬主人的身份而特意制作的。在所有出土的贾湖骨笛中,有一“ ”支八孔骨笛(M253:4)也格外显眼。不仅仅是因为它它是所有贾湖骨笛中孔最多的,更重要的是器体一侧吹口端与第一孔间有一

形刻符^[9]。贾湖契刻符号从公布之日起,就在全世界引起了极大的重视,它是目前所知全世界最早的原始文字。契刻符号的出现对我们研究中国史前文明和文字的起源均有着重大的影响。在这支八孔骨笛上有契刻符号的存在应该不是偶然,因为它并非是孤独地存在,而是伴随着其它数十个契刻符号一同出现。正因为骨笛的珍贵性,所以八孔骨笛上的契刻符号可能也是墓葬主人一种身份的象征。

四 结语

音乐作为人类文明发展史的重要标志之一,它在探寻史前文明过程中的地位相当突出,而作为史前音乐的重要载体的原始乐器,特别是骨制乐器,由于能长期保全,在考古发掘中显得格外引人注目。正如《舞阳贾湖》在第 1020 页对贾湖骨笛的总结中所说的一样,舞阳贾湖骨笛在距今 9000 年之前已经形成,说明在 9000 年之前,在中国的中原地区已开始绽放音乐文明的曙光。这也使得上文中提及的 5 万年前的国外骨笛与 9000 年前的贾湖骨笛在年代上的差距不可避免地被放在一起,成为比较对象,因此如何正确看待两者在年代上的明显差异显得尤为重要。在单纯数字比较的后面,容易被人们忽视的是,音乐作为人类文明的标志之一,它的发展是需要长期积累的,这反映在原始乐器的制作上,就是骨笛的制作也必须经过长年累月的积累、一步一步地由简到繁、由初级到高级发展起来的。这从国内贾湖遗址的 7 次发掘过程中可以明显感受到历史积累在贾湖骨笛上刻下的印记。

在贾湖文化存在的千余年时间跨度中,贾湖骨笛的制作经历了早、中、晚三个发展时期,期间演化了 2 孔、5 孔、6 孔、7 孔、8 孔等多种形制,并能分别吹奏四声、五声、六声和七声音阶。值得一提的是,每支骨笛所发出的自然音序中都包括了 C6 这个音,它与现今公认的 C6 的音高相距甚微。虽然当时的演奏水平不得而知,但单从自然发音来看,贾湖骨笛已确定了乐制的完备的五声体系。特别突出的是贾湖骨笛中编号为 M282:20 号 7 孔骨笛上出现的小 7 孔,通过测音研究发现,这个

小 7 孔具有调节大 7 孔音高的作用,这些发现表明贾湖的先民们在距今 8000 年的久远年代就已经形成了自己的音乐标准和追求,这反映在骨笛的制作上即形成了相对固定的形制和熟练的制造工艺。尽管当时的制造工艺限于文字局限而没能记载下来,但从早期骨笛身上为计算开孔而留下的刻痕到晚期直接开孔,可以看出音乐和乐器的制作在当时已经拥有了相当深厚的积累。它至少也表明在 9000 年前,贾湖地区已经出现了相对发达的音乐文明,而要达到当时的贾湖文明水平,必然需要经过岁月的积累,经历一个从量变到质变的跨越过程,几万年,几十万年甚至更久远的时间沉淀,贾湖先民们才达到了当时的音乐文明水平。前文中所提及的为何国外出土骨笛的年代要比国内久远的问题。它从一个侧面作出了回答,并不是因为国内史前文明起源晚于国外,恰恰相反,9000 年前的贾湖骨笛向人们昭示了更久远的史前文明存在的必然性,也给考古工作者和中华史前文明研究者指明了更加长远的目标。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音乐的发展水平以及乐器的制作水平是与当时的社会发展水平紧密联系的,作为史前音乐的标志之一的贾湖骨笛等乐器本身承载着深厚的社会文明,单纯追求出土年代的久远或是工艺水平的高低都是不够全面的。贾湖骨笛的出现不仅仅是作为音乐文明发展的见证,还是当时社会文明水平的重要标志,因为作为持有者的某种鲜明的身份象征,贾湖骨笛的出现表明了当时的社会文明已相当发达,人们除了考虑基本的物质生存之外,还有着某种超越物质的追求,这种追求或许是带有某些“宗教”起源的,或许是出于纯粹“音乐”性的还有待人们进一步的发掘和考证。但仅就这种追求本身就足以使我们相信必然存在着比贾湖文明更加久远的史前文明。

[1]李凭、金银先:《中华文明史》第 1 卷,河北教育出版社 1994 年,第 339~343 页。参看本书《灿烂音乐文化的见证》一文。

[2][3][4][7][8][9]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舞阳贾湖》,第 45、4~5、802~803、454~455、452、985 页,科学出版社 1999 年。

[5]魏丰等:《浙江余姚河姆渡新石器时代遗址动物群》,海洋出版社 1990 年。

[6]赵清:《关于龙山文化的考古学思考》,《中原文物》1995 年第 4 期。